

元大都城建造傳說探源

陳學霖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一、序言

一二六七年（至元四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元世祖），用漢人謀臣劉秉忠（即僧子聰）的獻議，以金中都城與宋汴京為藍圖，在現今北京修建一座宏大的新城。一二七二年（至元九年）下詔更名，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大都，也就是為明清北京城奠定基礎之中古偉大都城。自此以後，這座蒙古帝國和元朝統治的京師，中古歐西稱為汗八里（Cambaluc）之大城（原出突厥語，意為「君主城」），便變成一代政治經濟、商業貿易、各民族互相往來，和中外文化交通的重鎮。大都城這些多元化的熱鬧情況，不獨在元明清的載籍和詩篇有翔實生動的記敘，並且通過著名之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3），在其世界遊記中豐富誇張的描述，傳名到歐洲，成為中古帝王和商賈所羨慕，渴望來往溝通的對象。半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大都城的研究十分注視，成績斐然，而最近三十年，北京地區的考古隊伍陸續辛勤發掘，文獻工作者努力整理古籍，擴大研究的視野和資料，使我們對這一世界聞名偉大古城，有更深入的認識¹。

1 關於元大都城的近人論著，詳見本篇附錄。國人著述以朱啓鈴、王璧文，及朱偰專論大都之宮苑、城坊與宮殿制度最為詳盡。馮承鈞曾翻譯 A.J.H. Charignon 校註之 *Le Livre de Marco Polo*, 3vols. (Peking, 1924-1928)，題名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中華書局，1955年重印）（共3冊），其對大都城之描述見第2卷，第85—97各章（中冊，頁323—402）。參閱余士雄主編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12）所收有關論著。近十餘年來新作，以考古1972年第1期，所發表大都城的勘察和發掘報告，科技史文集第2

舉凡中外名都，由於歷史久遠，世代迭有經營，多留下琳琅的文獻紀錄和瑰麗的名勝古蹟，但同時亦孕育玄怪神話和荒誕傳說，流播人間，久而不寢。歐西之雅典、羅馬、巴黎、威尼斯、君士但丁堡，其都城的肇興和變革，皆有離奇詭異神話。中國文化深厚綿長，古都衆多，著名的如長安、洛陽、開封、金陵，亦不乏神怪奇趣傳說，元大都並不例外²。大都城的傳說，泰半環繞着劉秉忠建城事蹟，元明之際野史碑乘頗有記載，謹將資料臚列如次：

(一)張昱張光弼詩集卷三「輦下曲」：「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苦土築那吒城。讖言若以磚石裹，長似天王衣甲兵。」³

(二)長谷眞逸農田餘話卷上：「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世祖庚申(1260)即位，至國亡于戊申、己酉(1368，1369)之間，經一百一十年也。」⁴

(三)闕里外史行素(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遺編卷一「上都避暑」：「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極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傳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

輯(1979)，刊載趙正之對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與陳高華之通論元大都(1982)為最重要。侯仁之氏歷年有關古代北京城論文，收入所著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1980)，及與金濤合著之北京史話(1982)，對大都城的研究亦極有貢獻。此外，北京史研究會所編燕京春秋(1982)，北京歷史考古叢書編輯組主編北京文物與考古(1983)，及北京環境變遷研究會編輯環境變遷研究第1輯(1984)，俱收有多篇探討元大都歷史地理的論著。最近，北京大學歷史系所編寫之北京史(1985)第5章，對大都城的歷史亦有扼要敘述。日本學者對大都城研究，以村田治郎與駒井和愛為先驅，六十年代論著僅有愛宕松男一篇，然最近杉山正明專著汲取中國學者成果，有深入分析與見解。西文著作則有 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所撰之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81)，及已發表之短篇，皆以藝術建築史觀點立論，頗具功力與新意。

2 有關歐西古代都城之建設與神話，參見 Arnold Toynbee, ed., *Cities of Destin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67) 所收個別都城之論文及附錄書目。中國古都不乏傳說，大多與建置有關，但絕少學術研究，稍為涉及者，可見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所收 Arthur F. Wright 與 F. W. Mote 對長安、臨安、北京與南京之論述 (pp. 33–73, 101–53)。近年中國大陸出版不少關於著名都城之史話及民間風物傳說等通俗性書籍，但仍未有研究古都傳說之專著。

3 四部叢刊續篇本(1934)，卷3，頁15下。

4 收入陳繼儒寶顏堂祕笈(1922)廣集第4，引文見頁3下。

。明日，以土築城基，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聞宮殿已爲寇所焚燬。上都千里皆紅寇，稱偽龍鳳年號，亦豈非數耶。」⁵

(四)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元劉太保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冀稍潤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⁶

(五)同前書卷三下「雜制篇」：「元世祖旣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諄。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⁷

(六)同前書卷四下「雜俎篇」：「初，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⁸

上述提到的劉太保就是劉秉忠。「太保」爲忽必烈所賜榮銜，由是有此稱號。這些大都建城的俗說瑣談，無疑以「那吒城」傳說，相傳劉秉忠制定十一座城門，去象徵附會那吒神的「三頭六臂兩足」，最爲奇異怪誕膾炙人口。這一謠傳，對後代北京城傳說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因爲暢行當世的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故事，說明太祖的佐命軍師劉基，按照哪吒的身軀模樣畫圖建造北京城，便是從大都城的傳說敷演出來。究竟劉秉忠建城，有無援召神祇作爲扶持，那吒是那一類的神，原本史事何以渲染成駭俗的傳說，學者罕有注意，真相模糊不清。本文的主旨，不但在考究這些傳說的來源，釐清事實，作爲研究大都城與元初史事之助，並且希望透過這個命題，對現代北京城建造傳說的孕育、流傳，和京師民俗信仰之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⁹。

5 豐雅堂叢書本(1862)，卷1，頁1下一2上。

6 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59)，頁41。

7 同上刊本，頁63。

8 同上刊本，頁83。

9 愛宕松男於所著「元の大都」，頁61，首先揭示張昱「輩下曲」大都「那吒城」資料；陳高華元大都頁51又引錄長谷真逸農田餘話申釋「那吒城」故事一條，可惜二者俱未進一步研究。杉山正明近著「クビライと大都」頁517、註18，揣測「那吒太子」與「シグア神の變身Nataraja(誦の王)」有關連，但未說明其與大都城傳說的關係。關於那吒的事蹟，參見下註35—39。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故事甚多，詳見金受申北京的傳說(北京出版社，1981)，頁3—8；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北京分會編，北京風物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

二、大都城修建的背景與經過

在未入主題之前，茲將大都的歷史地理作一概述。這座著名都城所在的北京區域，在蒙元帝國興起以前，已有千多年輝煌的城市發展歷史。在傳疑之三代，它是屬於幽都或幽州，到公元前一千年的周朝時隸屬燕國；及武王分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既而燕盛并薊，因遷都其地，故城在今北京廣安門附近。春秋戰國之際，燕是七雄之一，薊遂成華北平原的重要都邑。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廢封建爲郡縣，燕分作六郡，以薊爲廣陽郡治所¹⁰。自此沿漢至唐一千年間，薊城變爲開拓北方，防遏遊牧民族入侵的重鎮。從古以來，薊都由於氣候無常，雨量失調，時遭水旱災害，因此地方職司很早便在城郊進行水利工程。例如在曹魏時代（250），郡守就在今日永定河（古潞水、金元明稱盧溝河）上，建築戾陵遏攔水壩，開鑿車箱渠，把分出的河水注入薊城西北的高梁河，灌溉大量土地。隨後（262），又重修戾陵遏，並在高梁河上游，增闢水道東趨現今之潮白河（古潞水），溝通薊城東西的天然水系，對後代北京水源的疏導發生很大作用¹¹。

到了隋唐兩代，由於軍事上的需要，薊城有重要之發展。隋文帝統一中國，更定疆域，仍設幽州（583），煬帝時改置涿郡，亦以薊爲郡邑，作為向東北擴張，三次遠征高麗的基地。唐朝肇興，復立幽州，仍以薊爲治所，又稱幽州城。幽州城在唐代有顯著的拓展，不但是軍事重鎮，又是農業生產和手工業中心。根據記載，幽州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座門，城內劃分爲若干坊，坊的四周築有圍牆，城區北部設有固定市集，稱幽州市，成爲

出版社，1983），頁1—7。本作者對此傳說故事之源流已撰專論，題名北京城建造傳說探頤——劉伯溫與哪吒城故事索隱，將刊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年紀念學術演講錄。

10 略見侯著史話，第2章；北京史，第2章。關於燕國、薊城的早期史跡，參見侯著「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載歷史地理學，頁141—146；葛英會「燕國的部族及部族聯合」，刊北京文物與考古，頁1—18。

11 見侯著史話，第2章；北京史，頁34—57。關於曹魏時代薊城的水利工程發展，參見侯著「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載歷史地理學，頁274—279，與蘇天鈞、王北辰所撰有關古代北京水源問題之論文，刊環境變遷研究第1輯，頁45—46，147—150。

中古之典型州城，為未來北京地區建城奠立重要基礎¹²。

唐朝亡後藩鎮割據華北，幽州地區先後為後梁、後唐兩政權統治，但到九三六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要篡奪政權，不惜求援於契丹，割讓燕雲等十六州作酬，幽州遂陷入外族之手。契丹主耶律德光（太宗），隨冊封石敬瑭為後晉皇帝，升幽州為南京，到九四七年滅後晉翌年，便正式建國號大遼。契丹由是雄據北疆，與崛起河南的宋朝成對峙之局，南京變為五京之一的陪都。宋代君主屢想奪回失地，可是多年皆不得逞，到真宗（1005）以契丹大軍壓境，訂下喪辱的「澶淵之盟」，歲輸遼主貢幣締結為弟兄之邦，更把收復的希望斷送。幽燕地區從此淪入異族統治，直到明代始回歸漢王朝¹³。遼朝統治下的南京，由於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日趨重要，到聖宗時（1012）更稱燕京，隸析津府，變成北方最大的都市。這時候的南京，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城址加以修繕，直至重熙五年（1036），才開始重修宮闈府署。根據記載，京城周長二十七里，有八座城門，皇城在西南隅，幅員五里，開三座門，內有宮殿與毬場，內果園和泛舟的湖泊。因為地理和形勢關係，南京十分繁華，人口稱三十萬，城中劃為二十六坊，街巷坊市，廨舍寺觀，井然有序，城區北部為市肆，是當時對內外商業貿易的中心。同時，由於遼主崇尚釋教，京城佛事十分興盛，城內外建有大量寺廟殿塔，成為當日華北地區釋教、文化藝術中心之重要都城¹⁴。

十二世紀初，女真族崛起遼東，在完顏阿骨打（太祖）統領下，建立金朝，繼而推翻契丹統治，奄有遼國的疆域，與宋朝分庭抗禮。始初（1118）

12 見侯著史話，頁28—34；北京史，頁57—68。

13 關於契丹佔據燕雲十六州的經過與影響，略見姚從吾「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大陸雜誌第28卷第10期（1964. 5），頁7—12；趙鐵寒「燕雲十六州的地理分析」，大陸雜誌第17卷第11、12期（1958. 12），頁3—7，18—22。關於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的始末及其意義，詳見蔣復璁「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載所著宋史新探（台北：正中書局，1966），頁100—150；王民信「遼宋澶淵約締結的背景」，書目季刊第9卷第2期（1975. 9），頁35—49；第3期（12月），頁45—56；第4期（1976. 12），頁53—64；又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第2章。

14 見侯著史話，頁40—46；北京史，頁69—79。關於遼朝統治下燕京（南京）的發展及其作用，詳見朱偰「遼金燕京城郭宮苑圖考」，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6卷第1號（1936），頁50—60；陳陸「遼幽州市容舉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1941. 9），頁38—48；那波利貞著、劉德明譯「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中和月刊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期（1941. 12—1942. 1），頁58—67，頁80—90；王玲、毛希聖「遼代南京燕京的歷史作

，徽宗謀與金國結盟夾擊契丹，協議雙方用兵以長城爲界，遼亡後金將幽燕地區奉還，宋仍以原來輸遼歲幣進貢。然而，金人渝盟（1123），在吳乞買（太宗）率領下重據燕京，並且渡過黃河直逼宋都汴梁。一一二七年正月，金人攻陷汴京，擄去徽欽二宗，北宋由是滅亡。自此以後，金主升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爲上京，以燕京爲管轄華北重鎮，後者地位因此愈來愈重要。到了完顏亮（海陵王）篡立（1150），爲要達成中央集權，準備侵略南宋統一中國，詔令大規模動工營建燕京新都宮城，三年後（1153）宮殿落成，便下令遷都，改稱中都，從此燕京遂成爲統治中國的京師¹⁵。

金主亮對中都的營建，主要是利用遼南京城舊址，參照宋汴京的規畫爲基礎。新建都城凡三重，大城周長三十七里，開闢十三座城門，東西南面各三，北面有四門；大城中的前方爲皇城，內有宮城，宮城西邊有風景優雅的苑囿。中都城設計最突出的，是將發源城西的西湖（今之蓮花池）、中間一條名洗馬溝的小河，圈入城內，用來開鑿環城的護城河，又將河水引入皇城西部，建造優美的御用園林區。都城內規畫整齊，共分六十二坊，東邊二十、西邊四十二，仍設兩縣（大興、宛平）分治。中都城建成後，金主徵召四方之民充實京師，人口由是大增，具體數字雖不可知，但整個大興府（包括十縣一鎮）共有戶二十二萬餘，較遼代多一倍以上。城中北部是全城最繁盛的商業區，設有官吏管理市場，徵收商稅。因此，中都城不但是豪華莊嚴、風景秀麗的京師，又是當日北方最熱鬧的商業貿易、宗教文化活動的都城，盛況一直維持到陷落於蒙古大軍前夕¹⁶。

完顏亮因南侵失敗被弑後，烏祿（世宗）嗣位，仍以中都爲京師，對都城的拓展有相當貢獻，如在大定十九年（1179），便詔令在中都東北、屬於

用」，載燕京春秋，頁10—20。

15 關於宋徽宗與金國結盟夾擊契丹始末，詳見趙鐵寒「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記」，大陸雜誌第25卷第7—9期（1962. 9—10），頁9—14, 14—19, 26—34; Herbert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in *Études Song (Song Studies)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 ed. Françoise Aubin, Ser. 1, pt.1 (Paris: Mouton & Co., 1970), pp.60—68。海陵王篡位及其中央集權政策之展開，論者不少，略見外山軍治「金の海陵王」，東洋史研究第7卷第4號（1942. 12），頁33—53；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63），第1章；劉肅勇「論完顏亮」，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4期，頁89—99。

16 見侯著史話，頁46—55；北京史，頁82—87。關於金主亮對燕京（中都）城的擴拓及其都市狀況，詳見註14揭朱偰論文，頁60—80，及那波利貞著、劉德明譯文（下），頁91—97。又

高梁河水系的湖泊區興建離宮，初名大寧，後稱萬寧宮，作為憩息之所。這裏築有極富麗幽雅的樓臺亭閣，湖中有馳名的瓊華島，即後來忽必烈建造宮城地址，在今北海公園內。不過，世宗對中都最重要的建設，是浚治水道，把華北稅糧物資直接運輸至京師。始初，所有運輸係由水道匯集，然後循潞水（潮白河）逆流而上到通州，稱為漕運；但是從通州至中都的一段短距離沒有河道，開鑿運河却遇到極大困難。這因為中都地勢比較高峻，不能把潞水西引入漕河，所以起初要利用高梁河，從中游開渠引水東下通州注入潞水，然而流量有限，難以滿足需求。隨後，有司曾在高梁河上西北，元代稱甕山（今頤和園內萬壽山）、和玉泉山下的湖泊（今昆明湖），另鑿渠道引水注入運河。由於地形比降很大，必需沿河設閘以節流水（故別名閘河），但是這一渠道又因地勢峻陡，水急不留，容易成淺，以致舟膠不行。故此，大定十年（1170），世宗議決盧溝河（今永定河）以通漕運，於是重開古代車箱渠下游，稱金口河，引水東下城北的護城河，然後沿閘河直達通州以接潞水。這條渠道開鑿後仍未收效，皆因河床坡度過陡，水大易於衝決，水小又不能行船，所以不久便將金口河口堵塞不用。此後，中都的漕運屢屢遭受阻滯，要到蒙古政權改造運河，另闢新水源始能解決問題¹⁷。

金代中都城，經過半世紀的繁華昌盛，便因蒙古大軍入侵遭摧殘沒落，這是成吉思汗向女真政權發動全面戰爭的結果。一二一一年，鐵木真開始麾軍搶略河北，兩年後捲土重來，直逼中都。金宣宗乞和無效，一二一四年五月倉皇遷徙汴梁（南京），又後一年，蒙古統帥木華黎率大軍攻陷中都。這時中都城的宮闈，已因淪陷前後兩遭火災，殘破不堪，成吉思汗隨復名燕京，作為華北的行政中樞。此後歷經窩闊台（太宗）蒙哥（憲宗）時代，燕京都是統治漢地的重鎮，但未有大規模修繕，直至忽必烈登位才有劃時代的發展¹⁸。

一二五九年秋，蒙哥（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長子）遠征南宋，殞命於四川合州釣魚城軍次。翌年五月，胞弟忽必烈得到多數王族推戴，壓倒幼弟阿

見 G.N. Kates, "A New Dat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Forbidden Ci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1942—1943) :180—202; 閻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7期，頁8—12。

17 見侯著史話，頁55—60；北京史，頁88—93。關於金世宗對中都城的建設與漕運的開展，又見註11侯著論文，頁281—288，與同註引蘇天鈞、王北辰撰文，頁46—48, 153—155。

18 見侯著史話，頁62—64；陳著元大都，頁21—23；北京史，頁93—96。

里不哥，在開平府（後稱上都，今內蒙正藍旗東）即大汗位。由於他底有學養的母親、莊聖皇后唆魯和帖尼所影響，忽必烈很早已受到漢文化薰陶，一二四四年，年未三十，居處和林潛邸之時，便開始延聘藩府舊臣和四方儒士，廣備諮詢，講明治道，為將來基業構繪藍圖。當中影響最巨的漢人謀士，就是禪宗大師海雲（宋印簡），和他的博學多才弟子劉秉忠（1216—1274）（時名釋子聰，稱聰書記，至一二六四年〔至元元年〕始奉詔復姓劉氏，賜名秉忠，字仲晦，號藏春散人）。一二五一年夏，蒙哥繼大汗位，隨遣其弟管治赤老溫山（Mt. Cilaghun，今河北沽源縣南）漠南的漢地。忽必烈於是在金蓮川地區（今內蒙正藍旗閃電河之地）設置幕府，在開平建築新城（事在一二五六年，由劉秉忠規畫，後稱上都），並加緊籠絡中原俊彥，以吸收經驗和爭取支持。一時在帷帳的漢人幹材，除劉秉忠外，有張文謙、竇默、張德輝、董文炳兄弟等數十人。他們倡議採用漢法，建官制，立法度，興學校，勸農桑，並曾於邢州（今河北邢台）藩地改革窳政，促進生產，由是民殷物富，州縣大治。忽必烈登基後，便大舉起用漢臣儒士輔政，創建官制朝議，定禮樂，立國子學，重農薄賦，並在燕京築造新都城，最後（1271）建國號曰「大元」，將蒙古統治中國帶進一新紀元¹⁹。

忽必烈所以選擇燕京為都城，因為它不但是歷史名都，而且又是管治漢地的中樞，對南下統一中國有很大的方便。當時受命設計新都的便是劉秉忠，他是大汗的親信，博覽經史兼通釋道。元史一五七「本傳」說他「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前此又曾規畫營建開平城（上都）。「本傳」述其事云：「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這裏記載簡略，對秉忠營造新都並未表彰，而他的傳記如「行狀」、「神道碑」，與同時人著述亦無

19 關於忽必烈的崛起及其援用漢人輔政始末，詳見姚從吾「忽必烈汗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收入所著東北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59）下冊，頁376—401；蕭啓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重刊所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頁263—301；拙著（Chan Hok-lam），“Liu Ping-chung (1216-74): A Buddhist-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 *T'oung Pao* LIII, 1-3 (1967): 98-146；張躍銘「試論士大夫在元初政權建設中的作用」，北方論壇1982年第4期，頁89—95；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8），頁27—64。

詳及，前賢因此頗有懷疑秉忠的實質貢獻²⁰。但是，最近刊行元末熊夢祥所著的大都志書析津志輯佚，有幾條資料可作補充，如在「朝堂公宇」目下便見以下三則²¹：

「至順二年七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奉旨：翰林國史院裏有的文書，依舊北省安置，翰林國史館人就那裏聚會，繇是北省既爲翰林院，尚書省爲中書都堂省固矣，殆與太保劉秉忠所建都堂意自遠矣。」（頁8）

「中書省：至元四年，世祖皇帝築新城，命太保劉秉忠辨方位，得省基，在今鳳池坊之北。以城制地，分紀於紫微垣之次。」（頁32）

「天師宮：在艮位鬼戶上。其內外城制與宮室、公府，並係聖裁，與劉秉忠率按地理經緯，以王氣爲主，故能匡輔帝業，恢圖丕基，迺不易之成規，衍無疆之運祚。」（頁33）

同書「歲紀」目下又記²²：

「世皇建都之時，問於劉秉忠定大內方向。秉忠以今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爲向以對，上制可，遂封爲獨樹將軍，賜以金牌。每元會聖節及元宵三夕，於樹身懸掛諸色花燈於上，高低照耀，遠望若火龍下降。」（頁213）

20 有關劉秉忠的傳記，詳見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叢書本，1879）卷7，頁1上；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57，頁3687。主要資料係他的同僚張文謙所撰「行狀」、王磐撰「神道碑」，與徒單公履所撰「墓誌銘」，俱收錄於劉氏文集藏春集（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6。近人對秉忠的論著不少，除註19拙著英文論文外，另有孫克寬「元代神祕人物劉秉忠及其藏春集」，收入所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書店，1958），頁99—106，與袁冀（國藩）元太保藏春散人劉秉忠評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2冊，頁1840—1841。關於上都城的營建與遺址狀況，詳見石田幹之助「元の上都に就しこ」，日本大學創立七十年紀念論文集第1卷：人文科學編（1960. 10），頁271—319；賈洲杰「元上都調查報告」，文物1977年5月，頁65—74。

21 析津志輯佚係由北京圖書館善本組主編，於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刊行。作者熊夢祥，江西豐城人，元末授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以老疾歸，年九十餘卒。關於熊氏生平，是書價值及輯佚經過，詳見卷首「整理出版」說明；又略見謝國楨評介，刊燕京春秋，頁234—244。

22 此條又見吳長元宸垣識略（北京出版社，1981），頁324，然引文最後一句僅書「遠望若火龍」，缺去「下降」二字。

上述資料足以證明劉秉忠規畫建造大都城，其中提到的「以城制地，分紀於紫微垣之次」、「按地理經緯，以王氣爲主」，正與元史「本傳」說他擅長天文地理、三式六壬遁甲之學吻合，也可見這些神秘玄學，在古代城市建築理論所佔的地位。誠然，劉秉忠雖是全權「經畫指授」大都城的營建，他一方面須與忽必烈旨意調協，另一方面又要與他的僚屬參議。例如，前揭析津志片斷所說大都「內外城與宮室、公府，並係聖裁」，便指出忽必烈的雄謨。此外，朝臣趙秉溫的「行狀」，亦提到他「與太保劉公同相宅」，並說他「因圖上山川形勢、城廓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圖赴功」，可見後者亦有一定貢獻。不過，劉秉忠全盤統籌規畫之功績，是文獻有徵，歷歷在目的²³。

然而，要深入研究大都城，除却鈎稽史乘，需要參照考古學者所發掘資料。從大都遺址的狀況來看，忽必烈考慮建造新都城時，最重要的決定是不在舊城基礎上修葺補充，而是利用近郊金世宗所建之萬寧離宮爲中心，重新興建城垣宮殿。根據專家的研究，這一決定基於三個因素：一是中都城過於殘破，原有的宮闈變成廢墟，特意修繕還不如從新更造；二是舊城城周三十七里，作爲一個人物阜盛大帝國的首都，已隘不足以容納；三是中都城所依靠、今日稱蓮花池的水系，容量有限，「土泉疏惡」，影響漕運和城市發展。在東北隅之金代萬寧宮則不然，該處有修竣的瓊華島，可作新城宮殿的基礎，而且周圍湖泊，上接高梁河，水源興旺，足以應付京都的需求²⁴。在劉秉忠和他的同僚悉心指授下，工程很快就開始；最先建造皇城、宮城和宮殿，始於至元三年（1266）；期年大城正式動工，再經過幾年，主要的宮殿次第完成。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詔改中都爲大都，宮城隨即竣工，但是大都城的基本工程，到二十年（1283）才完成，而兩年後始遷舊城居民入新城。一時監造的官員包括漢軍萬戶張柔、弘略父子，行工部尚書段楨（天祐）、管領石匠楊瓊、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驥和大食人也黑迭兒等，動用工匠數百萬，耗費錢財物資無算，經過十多年才建成這一巍峩宏麗、

23 關於劉秉忠對大都城營建的實質貢獻，見註20揭袁冀專著，頁96—99；陳著元大都，頁36—38；侯著史話，頁75—77，與顏吉鶴「劉秉忠主持修建大都城」，學習與研究1983年第10期，頁42—43。趙秉溫是時任尚書禮部侍郎，仕履詳見蘇天爵撰「行狀」，載滋溪文集（適園叢書本，1916）卷22，頁4上；元史卷 150，頁3555（附趙彥傳）；又見王德毅等編前揭書第3冊，頁1745—1746所引資料。

24 見陳著元大都，頁33—36；侯著「元大都城與明清北京城」，載歷史地理學，頁160—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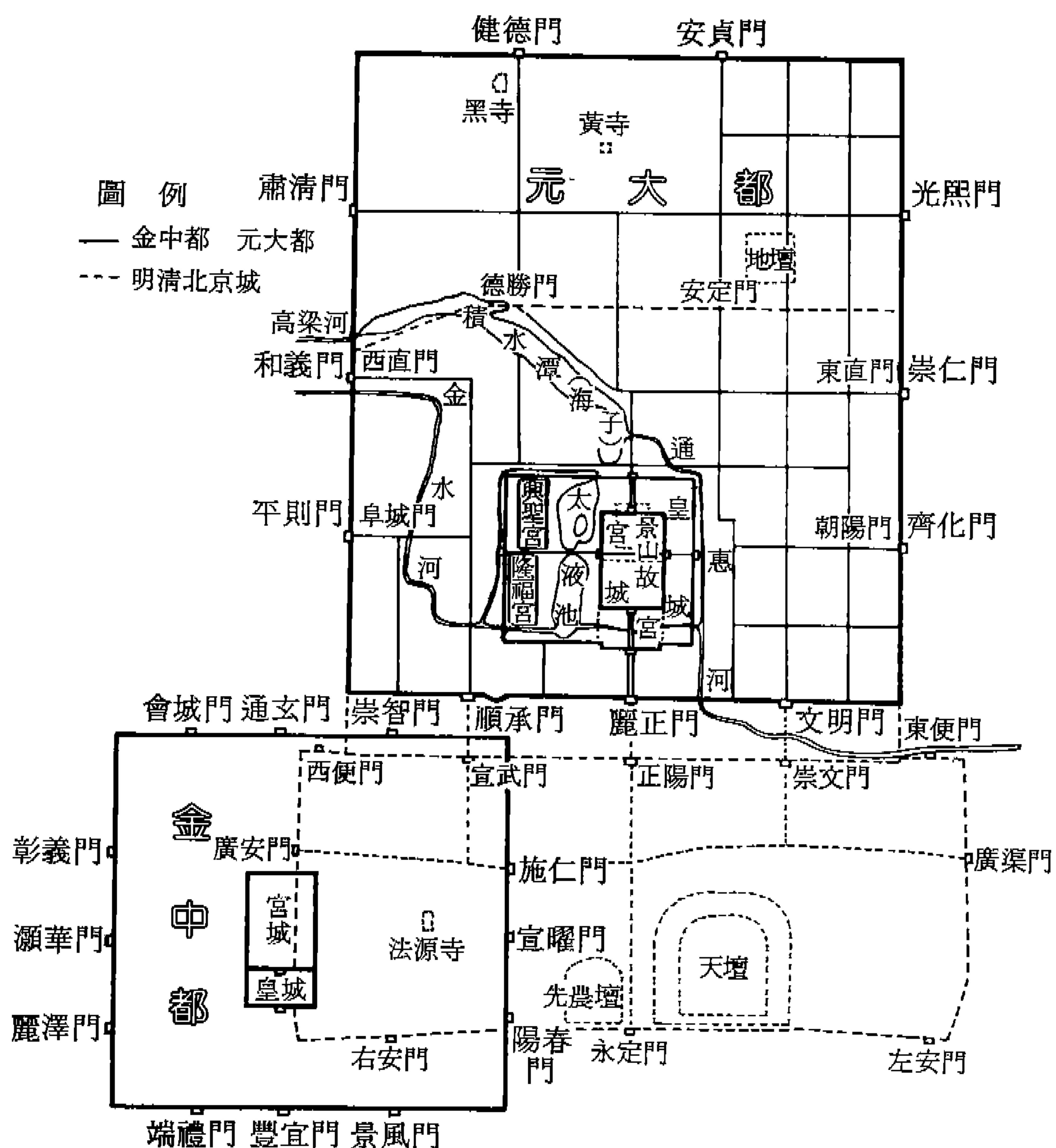
舉世知名的偉大都城²⁵。

劉秉忠籌畫建造大都城，從現存遺址的規模來看，基本上是遵照中國傳統皇城設計原則，去具體表現天極至尊、皇極神授的思想。周禮冬官「考工記」所描述之理想皇都：「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便是後世規畫都城的圭臬。北宋汴京和金中都城，都根據這一稽古的藍圖營建，大都城亦然，不過它還考慮到基址上的建築和水源。由於在決定建造新城時，選擇中都東北萬寧離宮的湖泊區為中心，新建宮殿便按照地形，分三組鼎立，環列後來稱為太液池的東西岸。東岸興築以皇帝正殿為主的宮殿（大內），即明清紫禁城前身；西岸另建南北兩組宮殿，分別為皇室所居。在三組宮殿四面，後來加增一道城牆（稱為「蕭牆」）建成皇城，然後在外面環繞興築大城。大城設計最突出的，是以在太液池東邊的宮城為中心而開始建築。這處恰好位於全城的中軸線上，沿宮城的中心線向北延伸，一直到太液池上游名積水潭（海子）的大湖東北岸，便選定全城平面佈局的中心。這個中心點上豎着一石刻的測量標誌，題為「中心之臺」，位置相當於今日北京城內鼓樓所在地。中心臺建立後，便用它起點向南包括皇城的一段距離作為半徑，以確定南北城牆的位置，又用往西包括積水潭的一段距離作為半徑，來確定東西城牆的位置。這樣精確的測量和佈局，充份把理論和環境配合，在古代城市建築史上實是創見²⁶。

25 見陳著元大都，頁36—38；同作者撰「元大都史事雜考」，載燕京春秋，頁139—144。關於負責監工官員的事蹟，略見元史卷147，頁3471（張柔、張弘略）；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卷17，頁16下（野速不花、高鶴）；同書卷23，頁5下（段楨）；陸文奎牆東類稿（四庫全書珍本別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12，頁13下（野速不花，此本譯作伊蘇布哈）；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本）卷9，頁51上（也黑迭兒）。有關張柔父子、高鶴與也黑迭兒之傳記資料，又見王德毅等編前揭書第2冊，頁1061—1062，1123—1124，1010；第5冊，頁2401—2402。

26 見陳著元大都，頁52—58；註24揭侯著論文，頁164—174；註9揭杉山正明論文，頁495—505。周禮冬官、「考工記」引文有多家詮釋，見周禮注疏（鄭玄注、賈公彥疏）（四部叢要本（1936）卷41，頁14上下。關於「考工記」城邑規劃制度之研究，詳見賀業鉅考工記管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有關北宋汴京之設計藍圖，論者甚多，略見 E.A. Kracke, jr., "Sung K'ai-feng: Pragmatic Metropolis and Formalistic Capital,"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ed. John W. Haeg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 pp.49-77；吳濬北宋都城東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章。村田治郎於其「元の大都の都市計劃に就じへ」（建築學會論文集第8號

金中都和元大都城址位置图



大都城的外郭城周長六十里（實地測量爲二八、六〇〇米），南北略長，呈長方形。南牆在今北京城東西長安街南側，北牆在德勝門和安定門以北五里處，東牆和西牆與今日的東直和西直門，各在南北一條垂直線上。城牆全部用夯土築成，以葦蓑之，自下砌上，以防雨水摧塌。北面有兩座城門（東曰安貞、西名健德），其餘三面各開三門（東邊名光熙、崇仁、齊化；西邊名肅清、和義、平則；南面東曰文明、中間名麗正，西名順承），一共有十一座城門。南面本應亦只開兩座城門，但因爲宮城位於全城中央向南，有御道直通皇城之外，需在正中特闢一門（即麗正門）專備車駕出入，故此增多一座門。每座城門以內都有一條畢直的幹道，而兩座城門之間，亦多數加闢一幹道，彼此縱橫交錯，因此全城共有南北東西幹道各九條。在這些大道所劃分的地區，除却少數例外，又都是縱橫排列的街道。皇城外面便是居民區，一共劃分爲五十坊，採易經「大衍」之義，坊各有門，所以看來全城齊整，井然有序。這裏除却府署、佛寺、道觀和民居外，有三組重要的建築，那是在皇城東面的太廟、西面的社稷壇，和在城中「中心之臺」左方的鼓樓和鐘樓。此外，城裏有三處主要市場。一處是皇城以北，在積水潭北岸的斜街，稱「斜街市」，是全城商業最繁盛的地點。一在皇城之西，順承門內，今西四（牌樓）附近，名「羊角市」，是羊馬牛駱駝驢交易之所。還有一處在皇城之東，文明門內，今東四（牌樓）西南，名「舊樞密院角市」，廣雜不少商販，販售各類日常用品²⁷。

大都城最顯要部分，無疑是處於太液池風景區，建築金碧輝煌，巍峩宏麗，遠遠超逾遼金兩代的皇城。城牆周圍約二十里，東牆在今南北河源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皇城的中央偏東就是宮城，規模形制都是仿照汴京的宮闈制度。城址在太液

（1938. 4）一文，企圖論證大都城的平面設計本于蒙古族「幹耳朶」（宮廷帳蓬）佈置的形式，然以現今資料印證，實屬牽強附會，不煩冗辯。又詳見下註。

27 見陳著元大都，頁45—52，59—61；侯著史話，頁67—75。關於大都城平面設計的研究，詳見朱偰元大都宮殿圖考（1936），第3章；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國營造學社集刊第6卷第3期，頁69—120；王樸子：「元大都平面規劃略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70年第2期，頁61—82；趙正之：「元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輯（1979. 5），頁15—25。又參見王燦熾：「談大都的城牆與城門」，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頁49—57；註9揭杉山正明論文，頁505—515；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The Plan of Khubilai Khan's Imperial City," *Artibus Asiae* XLIV, 2-3 (1983): 137-58。

池東岸，周圍九里三十步，共有六座城門，所有宮門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十分壯觀。宮城的主要建築，就是南北對望的大明殿和延春閣，二者一同處於全城的中軸線上；大明殿最為重要，皇帝登極，正旦、會朝等重大慶典都在此處舉行。殿和閣後面都有寢殿，中間以柱廊聯接成「工」字形；寢殿東西又各有小殿，四周都有百多間周廡圍繞，略呈長方形。宮殿建築的形式和結構，主要是根據漢族傳統，但也揉合不少域外民族的技巧和風格，像建築上的畏吾兒殿，棕毛殿和小晶圓殿等。宮城設計亦有異於前代，就是把宮廷前空曠（後稱廣場）的位置，從傳統的宮城正門，遷移到皇城正門前方，於是使宮闈的佈置更突出，門禁變得更森嚴。宮城望北便是御苑，種植奇花異木，西面就是太液池。池中有兩小島，北面的是瓊華島，至元八年（1271）改稱萬壽山（又稱萬歲山），山頂著名的廣寒殿，就是全城最高點，倒影在池上，湖光山色，極為優美。南面的小島名瀛洲（今之團城），上有儀天殿，亦是帝王憩息之地。在兩島之間，有約二百餘尺長的白玉石橋，連接二者以方便交通。此外，太液池西岸，又有南北對峙的隆福宮和興聖宮，各建有正殿、寢殿和周廡，結構與宮城大體一致，分別為皇太子和太后之居所。這些在宮城郊的兩組大建築，輝煌豪華遠跨前代，把皇城點綴得更美輪美奐，雄偉壯大無比²⁸。

在營建大都城當中，職司者特別注意到城內外的水源問題。在這方面，劉秉忠的得力助手郭守敬——當世聞名之天文和水利工程專家——付出極大的貢獻。大都城內有兩條主要水道：一是由高粱河、通惠河（運河）構成的漕運系統；另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構成的宮苑用水系統。二者都有特別用途，不關涉民生日用，因為燕都地下水豐沛，居民多汲井水。但是在建城前後，這兩水道都需要浚治。首先，在至元三年（1266），為配合都城的修建，重開金代已封閉之金口河，以便引導盧溝河水來運輸建築材料，却因為河床過陡，水勢急湍，經常汎濫而沒收效。次項工程是疏浚玉泉山下的河渠，俾使供應宮苑的金水河河水，能經過專闢的渠道直接流入城內。同時，專家們又注意到城內排水問題。根據最近的發現，大都城南北主幹大街兩旁都有排水渠，由石條砌成的明渠構成，可以將自北向南、順地形坡度流瀉的廢水排出城外。不過，大都的道路都是土築，雨水霖潦就出現泥塗坎陷，阻礙交

28 關於大都之皇城、宮城與宮殿的規模形制，詳見朱啓鈴、閻鐸「元大都宮苑圖考」，中國營造學社集刊第1卷第2期，頁1—117，與註27揭朱偰專著，第4、5各章。

通，排水渠並不能完全施展作用。最後，郭守敬所以垂名千載，便是開鑿運河改善大都的漕運。金朝曾嘗試很多辦法，並未能解決從通州到京師的運輸問題，因此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經過多年實地勘察測量，守敬提出新的浚治漕渠建議。他主張引導在都城西北六十里外、昌平神山（今鳳凰山）下之白浮泉水，西折向東南經甕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沿皇城東牆外南下，出東南城門與閘河（舊運河）相接。同時，又沿河建造新閘以節制流水，特別在坡度較大的河段，設置上下雙閘交替啓用，以調劑水量方便漕船。忽必烈批准他的計劃，翌年秋動工，到第二年至元三十年（1193）七月完成，共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四，又鑿六渠以灌昌平諸水。運河全長一百六十四里餘，隨命名通惠河，由是漕船可從通州直達大都城內，解決財政和民生需要一大困難²⁹。

在忽必烈悉心經營下，大都很快成爲規模宏大，建築瑰麗，人口衆多，繁華茂盛的京都——根據元初記錄，都城有戶逾十萬，口約四、五十萬，除定居的漢蒙、色目，和其他北方民族，還有衆多從中亞、歐洲來作短暫停留的使節商賈。因此，大都既是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中樞，又是當代世界最富庶、和商業最發達一首要都城。這些多姿多采的發展，不論是政治的權力鬥爭，中外貿易往來的頻繁，多元宗教的蓬勃（包括佛道二教、喇嘛教、回教和基督教等），或是程朱理學及其他漢文化之活動，文獻都有歷歷的記載。還有，透過到中國訪問的外國商人使者，像著名之馬可波羅，在他底世界紀行渲染誇張的記述，大都（Cambaluc）城恢宏壯麗的建築，富庶繁華的市容，便展轉流傳到歐洲，引起彼邦朝野上下的驚奇和渴慕。故此，大都城極有歷史性的貢獻，甚至不因元朝覆亡而消失，因爲半世紀後它又成爲明朝的京都，發揮簇新的功能和使命³⁰。

29 見陳著元大都，頁38—40；註24揭侯著論文，頁175—182。關於大都城的水源問題與運河開鑿的始末，詳見註11引侯著論文，頁288—294；又見蘇天鈞「郭守敬與大都水利工程」，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頁66—72。郭守敬元史卷164，頁3845有傳。近人撰述郭氏傳記甚多，詳見李迪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又見潘肅、向英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0 見陳著元大都，第4—6章；侯著史話，第5章。有關馬可波羅對大都城的描述，見註1揭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有關章節，及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1973), vol. 1: 140—42; vol. 3: 843—45。又參見張寧「馬可波羅行紀中的元大都」，刊余士雄主編前揭書，頁85—106。

三、大都城傳說的起源與演變

大都城既然興建於有千多年歷史的幽州城，繼承遼燕京和金中都的基業，擁有殷富古蹟文物，深厚文化傳統，自然很容易產生神異駭俗的傳說。這些傳說故事最饒趣味，意義深長，和影響廣遠的，根據前揭資料，多是關於忽必烈授命劉秉忠規畫修建新都城，爲蒙元統治奠定基礎。此類傳說的發生，一方面反映民衆傳統上對歷史英雄的崇拜，把能够達成的艱難險阻任務，歸功於舉世異才的超凡智慧和特殊技能。另一方面，它顯露當代民衆的政治與社會意識，透過渲染這些大規模工程的施展，和神化從中旋幹的英豪人物，來表達他們的心聲與抉擇。在這些大都城傳說故事出現的劉秉忠，便是京師民衆崇拜英雄觀念所神化的產物。但事實上，他底神化亦有根原，並不純出虛構冥想。這因爲根據元史「本傳」和其他記錄，劉秉忠此一城市設計專家，不但是個儒道釋「三位一體」的政治家，博學多才藝，精通天文地理、三式六壬遁甲，而且喜愛玩弄迷信，常把軍政機要的決定，以神秘詭異的方式去表現，來爭取蒙古大汗信服。因此，劉秉忠的高超才智技能和摸索迷離態度，便不期然被好事者穿鑿附會，成爲大都城建造傳說的基本源泉³¹。

有關大都城傳說故事，在這裏蒐集到的，都是出於元末明初私家著述；因此，依照時代和背景來看，若果作者並非捏造而是依據耳聞筆錄，此類傳說應該在元朝中葉已經萌芽。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根據性質分爲兩類。一是如孔克齊靜齋至正直記，葉子奇草木子所載，記敍劉秉忠與忽必烈對話，闡明何以選擇燕都爲京城，及其在建城時發現凶兆，因而預言元祚不永的傳說。一是如張昱「輦下曲」、長谷貞逸農田餘話所記，解釋劉秉忠爲何制定大都十一座城門，去象徵那吒神的身軀，並申述所附帶之政治意味的野聞。從作者報導的地域來看，前者因爲涉及紅巾軍起義，可能傳自淮北，而後者關係大都城的建造，顯然始於京師，然後轉展流傳於外³²。

31 見註20引元史劉秉忠傳及劉氏藏春集附錄，又見同註19揭拙作英文論文，pp.102-113。

32 草木子作者葉子奇，處州龍泉人，明初獲薦任巴陵縣主簿，未幾因事株連下獄，足跡未出江南。仕履略見何喬遠名山藏（崇禎13年〔1640〕刊本）卷97，頁6下；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卷63，頁10上。孔克齊粵雅堂叢書本靜齋至正直記遺編誤植孔齊。克齊父文昇，爲至聖五十四代孫，以贊於溧陽沈氏，因家其地，後獲薦授黃岡書院山長，召爲國史編修。

綜合來看，這些神異駭俗的故事，不但反映在蒙元統治時期，北方民衆對燕都若干世代傳聞崇信不衰，而且透露他們對傳統意識、和當代政治某方面的態度與願望。顯而易見的，他們假借都城的修建，一則神化心目中的英豪劉秉忠，把艱鉅工程的完成作神秘解釋，歸諸他的超凡智慧和特殊才能；一則藉此渲染誇大漢人輔弼在元廷的作用，喻指忽必烈對他們的殷倚，并借古諷今，預言外族政權敗亡。例如，靜齋至正直記說劉秉忠要遷都大都時，以地有龍池，不能乾涸，因奏忽必烈當借地於龍，便是敷演燕都民間深信龍王治水的傳說，附會於劉秉忠，使以神化張揚其應付都城之水源問題。至於草木子所記故事，謂劉秉忠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以稍潤其土，并記其與忽必烈對話，解釋何故棄上都而取大都爲京師，亦是附會當日擇都建城，尤其考慮開闢水源的史實，以此神化劉秉忠的英雄形象與奇智異能。然而，這些故事俱引伸大都城建造的史事，奢言元廷不祚，如靜齋至正直記增飾劉秉忠「借地於龍」的傳說，與反蒙的紅巾軍事蹟配合，謂紅巾領袖稱龍鳳年號是元亡的應驗。又如草木子記劉秉忠築大都城時，開基發現一巨穴，內有紅頭蟲，忽必烈問爲何祥，秉忠答云「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更顯明地將建城之事，與元末民衆抗蒙戰爭連貫一起。當日大都建城開基時，曾否發現「紅頭蟲」誠有疑問，不過故事所以提出，無疑影射頭裹「紅巾」，反抗蒙古的白蓮彌勒明教徒衆，而所言「異日亡天下者」之云，便是暗喻紅巾軍旗開得勝，創立明朝，重建中華正統。這些附會大都建城而預言元廷覆亡的傳說，顯然是淮北民衆鑄起反元的宣傳產物，由於這一關鍵，大都「那吒城」的傳說便愈更開展，增廣它的意義和擴大流傳³³。

元末避兵居觀之東湖，記所見聞，成至正直記四卷。傳記見江進等纂弘治溧陽縣志（弘治11年〔1498〕刊本）卷4，頁29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卷2，頁65；又見王德毅等編前揭書第1冊，頁47。根據上述資料，葉、孔二人所記大都事，皆係間接採錄傳聞。張昱江西廬陵人，元末楊完者鎮撫江浙，用爲參謀，後遷行樞密院判官，明初徵召至金陵，以年老遣還。行誼略見邵遠平元史類編（掃葉山房刊本，1797），卷36，頁26上；柯劭忞新元史（天津退耕堂刊本，1922）卷238，頁9上；又見王德毅等編前揭書第2冊，頁1060—1061。光弼「輩下曲」作於寓居大都時，故所敍「那吒城」故事當係採自燕都談舊。長谷眞逸是外號，本姓名籍貫仕履不詳。

33 關於元末紅巾軍鑄起淮甸，反抗蒙古統治，建立明朝的事蹟，近人論著甚多，較重要者見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方學報第13卷第2號（1923），頁278—302；王崇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改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卷（1943.5），頁57—71；吳晗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修訂本，1965），第2章；與 John W. Dardess,

以上所揭傳說故事，最玄秘詭異的莫如張昱「輦下曲」、長谷真逸農田餘話所載，解釋劉秉忠制定大都十一座城門的緣故。前節已言，大都城既爲長方形，東西面各有三座城門，北面有二門，則南面亦當有兩門相配，一共應有偶數之十座城門。它所以南面開闢三門，使全城有十一座城門，是因爲宮城居中央向南，有御道直通皇城之外，故此特闢一門專備車駕出入。民間傳說則不然，另有奇異光怪的解釋。根據「輦下曲」所錄：「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苦土築那吒城」，和農田餘話的申釋：「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劉秉忠所以開闢十一座城門，是要象徵配合那吒神的身軀；南面三門象徵三頭，東西六門代表六臂，北面兩門配合兩足。農田餘話末節復補充一筆，說元世祖卽位至元朝滅亡，恰好百一十年，因此燕都十一門也是亡國之讖，更加離奇怪誕。總而言之，這些充滿神奇色彩的傳說，不論是作者捏造，或是採自閭里，莫非揄揚劉秉忠能通神靈，未卜先知，誇張其超人的才智技能。它們不但透露民間的膜拜英豪意識，虔誠供奉神祇禱求解難禳災的心態，而且表襯漢人對蒙元統治的反抗，把流行的傳說渲染增飾，來宣傳鼓吹反蒙的意識和行動³⁴。

此刻我們需要深入考究的，是「那吒城」這個神奇駭俗傳說的始源，因爲它不但是大都城建造傳說故事的骨幹，而且是後代北京城傳說發展最主要的媒介。這一類傳說故事都是民俗信仰的結晶，是傳統文化一部分，不宜輕率指斥爲誑妄荒誕，必須探究其來歷根原。因此，我們要研究一個基本問題：那吒是怎麼樣的神，有何法力？何故設計大都城要依照他的身軀形象去摹畫圖則？

所謂那吒，明朝以後多書作哪吒或哪叱，字源出梵語 Nata，又譯作那擎、那吒俱伐羅等異名，是佛教四天王之一的毘沙門天王（Vaisravana，或譯作毘舍羅婆擎、吠室囉末那等名稱）的第三太子。（按唐玄宗開元〔713—741〕、天寶〔742—755〕年間，自北天竺傳入之密宗經典，如後揭不空所譯經文，有以那吒爲毘沙門王之孫，但此爲偏例。）毘沙門又名多聞天王，主守北方，掌領夜叉（Yaksha），有子五人，都是勇健的靈怪，以護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3 (May 1970): 539–83.

34 元末明初的私家雜著，不少記載有反蒙抗元意味之讖言異聞，除前揭之草木子而外，可見陶宗儀輶耕錄（台北：世界書局，1963）卷2「占驗」（頁46），卷14「古刻」（頁213），卷26「武當山降筆」（頁400），卷27「扶箕詩」（頁423）。

持佛法，守護國王國界，殄滅內奸外敵，降伏惡魔稱著，而以次子獨健、三子那吒最爲知名。到了唐宋之際，中原民衆出於崇拜英雄觀念，將已謚爲道教神祇的唐初名將李靖（571—649），與流行中國的釋氏四天王之一的毘沙門相化合，塑造一融合無間的毘沙門天王李靖，又稱托塔天王，寢而在說部雜著渲染爲勇猛超羣、法力無邊的天神。由於這個發展，原是在天竺稱著的毘沙門天王三子的那吒，便在中土變爲托塔天王李靖之三太子，成爲小說演義，民間信仰所熟識的「三頭八臂」，變化多端，勇不可當，降伏惡魔的神將³⁵。

佛經中記載的那吒，始見唐天寶年間北天竺密教高僧不空（Amogha, 705—774），奉詔譯的北方毘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此處以那吒爲毘沙門之孫，與一般經傳有異。其說如下³⁶：

「爾時那吒太子，手捧戟，以惡眼見四方白佛言：我是北方天王吠室羅摩那羅闍（即毘沙門）第三王子其第二之孫。我祖父天王，及我那吒同共每日三度，白佛言：我護持佛法，欲攝縛惡人或起不善之心。我晝夜守護國王大臣及百官僚，相與殺害打陵，如是之輩者，我等那吒以金剛杖刺其眼及其心。若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起不善心及殺害心者，亦以金剛棒打其頭。爾時毘沙門孫那吒，白佛言世尊：我爲未來諸不善衆生，降伏攝縛皆悉滅散故，亦護持國界故，說自心暴惡眞言，唯願世尊聽許。我說佛言善哉善哉那吒天王，汝爲降伏一切國王大臣百寮殺凌者，亦法佛相違者。爲降伏故恣汝意說眞言曰：唵地舍那吠室羅二合 摩擎野摩賀羅

35 釋傳密乘所記毘沙門天王，及第三太子那吒的事蹟，略見望月信亭編佛學大辭典（京都：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57）第4冊，頁3994；第5冊，頁4304所撮錄資料。那吒之名出自梵語Nata，與 Narya, Nara 等同源，俱有堅固、天界力士之義。略見 William E. Soothill,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Delhi: Motilal Barnarsidars, 1937), pp. 247, 248。關於毘沙門在中國民間釋道信仰與唐初名將李靖混合之經過，詳見柳存仁「毘沙門天王與中國小說之關係」，收入所著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1977）下冊，頁289—295。又略見同作者 (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en 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2), Chap. XI。

36 不空所譯經文載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第1247號，頁224—225。（此條及下註38、39所揭釋典，俱承香港佛教史專家友人曹仕邦博士檢示，謹此誌謝。）不空傳記資料見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24徵引。詳細研究，見 Raffaele Orlando, *A Study of Chinese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Life of the Tantric Buddhist Patriarch Amoghavajra (A.D. 705-774)*.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1.

惹野藥迦灑二合地婆哆那謨婆誠縛帝摩多羅跋駁爾婆嚮二合賀引。」

根據這裏，那吒不獨護持佛法，攝縛惡人，而且守護國王百僚，維持國界，除以金剛杖降伏暴惡，另備「真言」可使行者誦呪殄滅邪魔。儀軌續言³⁷：

「若行者受持此呪者，先須畫像，於彩色中並不得和膠，於白氈上畫一毘沙門神其孫那吒天神七寶莊嚴，左手令執口齒，右手詫腰上令執三戟稍。其神足下作一藥叉女住趺坐，並作青黑色少赤加。若誦此呪時，就好地勿使有穢惡，種種花燒香供養。行者上下衣服並須一清，一廁行時當護身，黑月十五夜起首，對像前誦呪滿三十萬遍訖，然後取香泥供養尊像。……若相違叛逆國王大臣百寮，有不善之心起者，以松葉護摩，七日之內，轉日羅底瑟驥。若有人比丘比丘尼犯者，以苦練木護摩，七日內殄滅。又法犯國王人有，以佉陀羅木上設都壇名字書，三角火中數數令出入，口誦上呪心想設都壇，降伏。…又法阿修羅窟門，當以三戟稍打，當自口開。又法以胡粉和塈護摩，領天供四萬人，必來自國兵敵，及他國兵，一時殄滅。心印者，二手內縛，二小二空出來去。昔五國大亂，有八箇月經月行多法遂無法驗。行此法降伏五國五萬軍自平安故，是名隨軍護法。」

依照經文所言，信徒只須供奉那吒神像和呪誦真言，所有「相違叛逆國王大臣百寮，有不善之心起者」，「比丘比丘尼犯者」，七日內殄滅，而「法犯國王人有」，「口誦上呪心想設都壇」，亦可以降伏。更且，施展類似的法術誦呪，還可以殲滅侵略敵兵，如唐朝中葉安西遭遇五國軍圍城時，即曾使用玄秘的行軍法術收效，因此經名稱爲隨軍護法。這裏所見那吒的造像，是「七寶莊嚴，左手令執口齒，右手詫腰上令執三戟稍」，「足下作一藥叉女趺坐，並作青黑色少赤加」，與後來出現於說部演義的塑型很有差別。又根據不空另譯的毘沙門儀軌所傳，玄宗天寶元年（742）二月，當大石、康五國（即 Taskand、Samarkand）聯兵圍河東安西時，毘沙門天王曾應聖旨率神兵出現城樓救援，擊退敵軍，而第二太子獨健同時領天兵防護其國界，三太子那吒亦捧塔隨侍天王左右。（內文有言：「…昔防援國界，奉佛教勅，令第三子那吒捧塔隨天王。三藏大廣智云：每月一日，天王與諸天鬼神集會日；十一日，第二子獨健辭王父巡界日；十五日，與四天王集會日；二十一日，那吒與父王交塔日。…」）³⁸由此可見，在密乘的傳統裏，毘沙門天

37 同上註引經文，頁225。

38 不空所譯經文見大藏經，第1248號，頁328；參見註35揭柳存仁論文，頁292—293。

王父子除却護持佛法，降伏惡魔外，還以守護國王和防援國界揚名。前揭隨軍護法儀軌所言施展行軍法術，降伏五國軍，顯然指毘沙門率領二子及神兵護城之事，也許當日就是利用此類玄秘法術完成任務，後來筆諸於書，成爲經文的一部分。

在稍後出的密教經典，如宋初中天竺高僧法賢（卒於1001年），於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奉詔譯的佛說最上秘密那擎天經，那吒却以伏龍的天神出現，稱爲那擎天，模相法力與前此的都不一樣。本經卷上「最上成就儀軌」分第一，描述那吒現身於世尊之前如下³⁹：

「…大毘沙門天王，與百千俱胝眷屬圍遼世尊。是時有天名曰那擎，色相殊妙，面現微笑，手持日月及諸器仗，衆寶嚴飾，光踰日月，以難陀、烏波難陀二龍而爲絡腋，得叉迦龍以爲腰條，有大威力如那羅延，亦來集會坐於佛前。…爾時世尊如是，安慰毘沙門天王已，卽入調伏夜叉熾盛普光三摩地，於其定中身放大光，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其光迴還遶佛三匝入於佛頂，復從面門出七色光入那擎天頂。時那擎天光入頂已，卽現大身如須彌山，面忿怒相復大笑相，而有千臂，手持葛波羅及諸器仗，以虎皮絡腋葛波羅而爲莊嚴，光明熾盛具大威力。是那擎天現此身時，大地震動，觀者皆怖。…」

這裏所見的那吒，「手持日月及諸器仗，…以難陀、烏波難陀二龍而爲絡腋，得叉迦龍以爲腰條」，活現伏龍的神威。經文隨後又說那吒「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有『心明』，善能調伏阿脩羅衆，及一切夜叉羅刹部多毘舍左等，乃至大梵天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咸令歸伏，亦能句召一切天龍之衆。世尊我此『心明』，是一切持明者最上成就之法。」所謂「心明」，就是咒語。降龍祈雨是佛經中很重要的儀軌，因爲依照中土古代迷信，不論何類宗教，都相信天龍控制雨水，能伏龍始能消旱。至於降龍之法，密乘亦有指示。前經「最上成就儀軌」分第二言：「…又法若行人欲降龍者，當塑作龍身安曼拏羅（按卽『天華』）中，以香花供養，用葛囉尾囉枝誦大明，加持一遍打彼龍身，復誦大明加持彼龍，卽現本身降大甘雨。…」⁴⁰由此可見，那吒的

39 法賢所譯經文見大藏經，第1288號，頁358。此條資料曹仕邦君曾引用，見所著「西遊記若干情節的本源七探」，書目季刊第19卷第1期（1985.6），頁3—4。法賢傳記資料見陳垣前引書，頁197 揭示。

40 見上註引經文，頁362。中國古代宗教信仰自唐朝以來，揉雜原始迷信與釋道二教，亦以龍爲雨師，天旱卽祭祀之以求甘霖。宋明兩代帝王多建龍王祠廟，封龍爲護國之神，遇旱則往

咒語有伏龍的威力，缺水之時，依法行儀便可得甘霖。

從上述的密宗文獻，我們可見自唐宋以來，透過經典的逐譯和民間的膜拜，那吒已成爲中土著名之釋教天神，具備護持佛法，降伏惡魔，隨軍護城，和降龍除旱等法力。因此，傳說稱劉秉忠制定大都十一座城門，去象徵那吒神的身軀便不難了解。依照釋氏的傳統，那吒既能守護國王百僚，殄滅叛逆惡魔，又曾隨從托塔天王領兵援城，正是保護京師最理想的神靈。況且，他又有降龍祈雨的法力，而大都常患水源匱乏，亟需這樣的天神坐鎮以攘除災難。現存關於大都的元代文徵，有兩處提到龍王，一則在析津志「朝堂公宇」目下，載「光熙門，與漕壩相接，當運漕歲儲之時，其人夫綱運者，入糧於壩內，龍王堂前唱籌。」⁴¹此處提到的漕壩，便是郭守敬開鑿新運河後用作漕運的環城水壩，在這裏建廟堂祭祀龍王，當是禱求庇佑水源豐沛。另外一則是前揭的靜齋至正直記，說「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這裏指出民間深信燕都有龍王控制水源，劉秉忠亦知之，故此獻議借地於龍，將大都建城需要開闢水源的事實，與向有龍王傳說融會一起。因此，這些例證雖然沒有提到那吒，傳聞附會劉秉忠建造大都「那吒城」，顯然與密乘所傳的毘沙門天王三太子故事有直接關連，這可以從釋氏經典和有關文徵，得到具體的證據。

我們需要補充的，就是那吒的傳說雖然脫胎於密教經典，但從俗文學資料來看，元末開始流傳的大都「那吒城」故事，却與盛行中土神格化的托塔天王李靖，及其第三太子的傳說有更密切關係。後者的孕育和滋長，無疑得力於密宗之推動，但是它的衍變和暢行，又借助於道教之流傳，和雜劇、演義，與說書的渲染增飾。由是故事散播民間，流傳廣遠不衰，後來還與其他盛行北京的傳說融會，產生近代膾炙人口的，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故事來。

簡而言之，作爲毘沙門天王李靖第三太子的那吒，在宋代以降的釋典和民間傳說，是一位「三頭六臂」的孩童天神，與見諸唐代密教經傳的有差別。那吒這般模相，大概出現於北宋後期，如圓悟禪師克勤（1063—1135）的

禱告，行祀龍祈雨之法。參見樊恭炬「祀龍祈雨考」，新中華復刊第6卷第4期（1948.2），頁36—38；又見瀧澤俊亮「龍蛇ヒ祈雨の習俗について」，東方宗教第20號（1962. 11），頁19—21、28—30；杜而未麟龜龍考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143—146。

41 析津志輯佚，頁2。

碧嚴錄第八十六則，便曾說「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他所以一變而爲「三頭六臂」，顯然是從密乘所擬那吒「善變」的形象衍化出來⁴²。前述元末雜著所提到的那吒，亦是「三頭六臂」，可見宋元時代膜拜的那吒神都大同小異。（那吒之現身爲「三頭八臂」，變化多端，神勇伏魔的托塔天王三太子，大概出自元明坊間的想像渲染，始見下揭的三教搜神大全，到隆慶、萬曆間，經過封神演義和西遊記等說部的改造增飾，便成爲有口皆碑，聞名廣遠的釋教善神。）從現存資料所見，那吒在元代是很受重視的神靈。據托名鄭思肖撰的心史，每年二月那吒太子誕日時，大都有舉行盛大的慶祝⁴³。那吒在元雜劇小令亦極爲盛行，如無名氏雜劇、「叮叮噹噹盈兒鬼」第一折有「黑臉那吒」，第二折有「那吒法」；雜劇又有「那吒太子眼睛記」劇目，小令有「那吒令」調名，而那吒之名亦屢見戲曲，常稱爲「狠那吒」，繁不具引。因此，附會劉秉忠的大都「那吒城」傳說故事，無疑是民間普遍膜拜那吒神的產物⁴⁴。

現存俗文學資料所記那吒的神蹟異行，數量類別雖然不少，但肯定屬於元代的只有殘存片斷，泰半都是明朝作品。這些玄怪故事主要來自雜劇小說，前者如佚名撰的「猛烈那吒三變化」，後者如封神演義和西遊記，大多光怪離奇，眩人耳目，盪人心弦。雜劇所見的那吒（通稱哪吒或哪叱），如見於前揭劇目，是個化身的善身童子，悟明心性，護持佛法，「有千變萬化之機，三頭六臂之勢」，憑仗天聖世尊的神力，諷誦呪文，即能攝伏妖魔，降邪歸正⁴⁵。封神演義出現的哪吒，更爲神奇靈怪，變化無端。是書第十二至十四回，記敍哪吒一連串的神蹟異行，如誕生爲一肉團，大鬧水晶殿，與東

42 碧嚴錄全名佛果圓悟禪師碧嚴錄，載大藏經，第2003號，有關那吒事蹟見卷9，頁212。

43 見上海支那內學院刊本（1933），卷下，頁74下。據近人研究，鄭思肖心史係明遺民擬作，但不排除其收有元代資料的可能性。詳紅研究，見姚從吾所撰關於鄭思肖之生平與鐵函心史之考證論著，刊姚從吾先生全集（七），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台北：正中書局，1982），頁139—200；魯同群「心史是一部偽書」，南京師大學報1984年第1期（1984），頁40—42；姜緯堂「辨心史非鄭所南遺作」，文史第18期（1983.7），頁203—210；與劉兆祐「心史作者考辨」，東吳文史學報第4號（1982.4），頁15—27。

44 略見註35揭柳存仁論文，頁295，頁330、註12。關於元明雜劇中之「那吒」劇目，見傅惜華編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178，283；同前編者明代雜劇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頁253，262。元小令有「那吒令」調名，見陳乃乾輯元人小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2。

45 「猛烈那吒三變化」作者闕名，戲文載孤本元明雜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頁

海龍王三太子搏鬥，抽去其龍筋，剔骨割肉還父母，現形爲蓮花化身，及父子交惡與托塔等故事，並未見於封神演義。這裏所見的哪吒太子，身長六尺，搖身一變爲一丈六尺，長出三頭八臂，頭戴金輪，身披八寶盔甲，手握火尖槍，腳踏風火輪，法力無比，勇伏羣魔，成爲後來雜劇、戲曲、小說和說書所沿襲的模相⁴⁶。

哪吒故事所見於封神演義之變化多端，無疑是由於作者想像豐富，溶裁各種材料，妙手創新所致。這些資料，除却嘉靖後出現的小說四遊記，和其他較早的釋傳、平話，最重要的殆是佚名編纂的三教搜神大全，所收滲入道教故事的「那叱太子傳」。此書有萬曆二十年（1620）刊本，「那叱傳」見卷七，以道教傳說的托塔天王李靖父子事蹟爲背景。茲鈔錄如下⁴⁷：

「那叱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磐石，手持法律，大歎一聲，雲降雨從，乾坤爍動。因世間多魔王，玉帝命降凡，以故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長子軍叱，次木叱，師三胎那叱。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腳踏水晶殿，翻身直上寶塔宮。龍王以踏殿故，怒而索戰，師時七日，卽能戰殺九龍，老龍無奈何而哀帝。帥知之，截戰于天門之下，而龍死焉。不意時上帝壇手塔如來弓箭，射死石記娘娘之子，而石記興兵，帥取父壇降魔，杵西戰而戮之。父以石記爲諸魔之領袖，怒其殺之以惹諸魔之兵也。帥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真靈求全于世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爲骨，藕爲肉，糸爲脛，葉爲衣而生之，授以法輪密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嚇一聲天顫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鐸一响龍順虎從，鎗一撥乾旋坤轉，綉毬丟起山崩海裂。故諸魔若牛魔王、獅子魔王、大象魔王、馬頭魔王、吞世界魔王、鬼子母魔王、九頭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鴉盡爲所降，以至於擊赤猴，降猴龍，蓋魔有盡而帥之，靈通廣大，變化無窮，故靈山會上以爲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將軍，玉帝卽封爲三十六員第一總領使，天帥之領袖，永鎮天門也。」

1—10。

46 哪吒太子故事見於封神演義者，主要在第十二～十四回（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此書作者舊題許仲琳，但柳存仁氏考證爲嘉靖萬曆間道士陸西星（1520—約1601），見註35揭英文專著，Chap. XII。柳氏又曾撰陸西星詳傳，收入所著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the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J. Brill, 1976), pp.175-202。關於哪吒在封神演義造像之取材，見前揭柳存仁論文，頁297—320，及其英文專著，pp.223-42。

47 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69）卷7，頁14上（頁330—331）。



那吒太子像

這裏所述情節，說那叱原是玉皇大帝駕下大羅仙，其後投身釋迦世尊，獲授法輪密旨，神通廣大，勇伏羣魔，遂被玉帝封為天帥領袖，與先前密教經傳記敍迥異。此可見在民間道教信仰，那吒亦受到重視，被汲取轉化成玉皇大帝的首席神將。然而這裏的故事，敍述雖然極度光怪離奇，體裁仍甚簡略樸實，比較起來，似應出於封神之前，而為其作者資取。三教搜神一書，雖然刻於封神演義之後，但據董賢研究，是書部分取材已佚的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因此有些故事可能出於元代，不宜統統視為明人產物⁴⁸。若果如是，這裏所載滲雜道教傳奇的那吒神蹟，極可能淵源於元代，由是成為從唐宋釋典、宋元平話，至明代小說演義所見哪吒故事發展的過渡橋梁。

依上推論，元明之際流行的那吒故事，與大都「那吒城」傳說有直接而密切關係的，除却密宗經傳敍者而外，就是三教搜神和稍後封神演義所載，滲入道教誌異的那吒太子腳踏水晶殿，殺死龍王三太子，抽去其龍筋，又與老龍大戰的情節。（這裏說那吒殺死龍王太子，抽去其龍筋，顯然取材前揭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言那拏以難陀、烏波難陀二龍而為絡腋，得叉迦龍以為腰條。）現代流行的北京城傳說，皆以為燕都時遭水患，因為其地是龍王的苦海幽州，水源被孽龍壟斷，故此要請那吒太子解難，由是產生劉伯溫製造「八臂那吒城」的故事。這樣看來，元明民間傳言劉秉忠制定大都十一座城門，去象徵附會那吒的身軀，原因恐怕不止是如密乘經傳所宣稱，那

48 明毛氏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列有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前後二集二本（見黃丕烈《禮居黃氏叢書》[1800]刊本，頁16上），葉德輝宣統元年（1909）撰重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即以是書為元板搜神記之異名。詳見李獻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頁4—5，譯自同作者著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頁61—62。董聚賢氏首先指出封神演義中的哪吒故事，係取材自三教搜神大全卷7之「哪吒太子傳」，見所著封神榜故事探源（自印本，香港，1960）上冊，頁152—153。

吒能護持佛法，禳除惡魔，隨軍護城殲滅敵兵，和具備「心明」降伏天龍，招致甘霖。它很可能是因為此時京都民衆，不但深信龍王盤據幽州，控制水源（從前揭靜齋至正直記，說劉秉忠借地於龍以興建都城，便可見大概），而且隨着道教之盛行，流傳那吒因沐浴與龍王三太子爭執，怒中把太子殺死，大鬧水晶殿的故事。若果兩者縝合，就更圓滿地解釋為何元代建造大都城，會產生這樣的傳說，和進一步了解近代暢行的，明代北京城建造傳說的起源和演變。

四、結論

從以上各方面探索，我們對大都「那吒城」傳說之起源及其形成過程，可以有一廣闊的，合乎邏輯的分析。主要說來，這個傳說故事表襯大都城的基本問題；作為蒙元帝國的京師，它需要神祇護佑，而且都城常患水源匱乏，更加渴望外力援助。在知識未開拓時代，一般民衆都相信神靈庇佑是惟一解救災難辦法，所以，具有伏魔法力的那吒太子，既能保護都城抗拒外敵，又能降伏龍王消除天旱，便很自然地成為大都居民膜拜對象。從這兩方面來看，這個大都城傳說，活潑地反映中古時代北方民衆的信仰，特別是京師居民對釋道二教英雄之膜拜，對民間宗教和民俗學的研究很有幫助。

然而，這個傳說最突出的，就是把技藝超凡，足智多謀的忽必烈輔弼、儒道釋「三位一體」的劉秉忠加以神化，將他本身的傳說與那吒神連貫一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在一方面，它流露民間傳統對英豪的崇拜，把劉秉忠看作絕代異人，能够感通外物，因此可以駕馭那吒，借用他的法力降伏龍王，解決居民缺乏水源之厄。不然，若果故事只強調那吒神的法力，沒有超凡的人物在其中斡旋，這樣的傳說便會流於像古希臘、印度一般玄怪絕塵的神話。在另一方面，這個以神化的劉秉忠為中心的傳說，又有政治上的意味，因為它渲染誇大漢臣在元廷之領導作用，影射蒙古統治者之顛頽，並且借古諷今，預言外族政權的覆亡，顯明地流露元明間民衆反抗蒙古的意識。由此觀之，這個神異駭俗的傳說，實際包涵很廣泛的歷史層面，對了解元明之際的政治文化、和民間信仰各方面，都有特殊的意義，值得我們研究。

元朝覆亡以後，代起的明太祖朱元璋以應天（南京）為京城，改大都為北平府，燕都因此沈寂一時，但永樂帝篡位翌年（永樂元年，1403），即還

都北平，興建新京城，隨着又恢復盛況。由於政治和民俗傳統的深厚，大都「那吒城」傳說在明代繼續流傳。例如下至弘治正德年間，在慈谿楊子器（1458—1513）所撰「元宮詞」六首，仍然提到這個故事。他的詠世祖一首說：「那吒城裏起樓臺，萬朵宮花次第開。見說南朝好兒女，遠隨帝璽渡江來。」⁴⁹這首詩不論是反映明人對元朝掌故的認識，或者表示此一傳聞在當世依然盛行，都足以說明「那吒城」傳說的持續性。事實上，這個馳名的大都城傳說，影響所及遠跨元明，因為如前所述，劉秉忠制定十一座門去象徵那吒神身軀的異聞，到清末民初與明太祖輔佐劉基的傳說混合，產生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故事，到現在依然暢行不衰。⁵⁰

關於劉伯溫製造北京城故事的起源和流傳，作者已有專論，此處不必贅述，這裏要提示的是與大都城傳說之關係。首先要注意，大都城傳說的客觀因素——京都需要神祇護佑和解決水源問題，從元亡到明清一直存在，而哪吒太子在民間釋道二教信仰的號召——特別是他降伏龍王消除水患的法力，通過雜劇、演史、說書的宣揚，一直深入人心。所以，現代北京繼續有此類傳說流行，是不足為異的。問題是何以故事中主人，一變而為劉伯溫，並且因此添增了很多更神怪奇異的傳聞⁵¹？這個發展主因是元亡明興，漢室正統重振，作為蒙古大汗輔弼的劉秉忠，隨而失去歷史重要性，但是北京城傳說之客觀因素並未消失，故此民衆亟需一位合乎時代要求的英雄人物，去延續悠久的傳統。劉伯溫之能適合需要，因為他有與劉秉忠相埒的廣博學識（通曉天文地理、足智多謀），又有類似的功勳事業（明太祖的佐命謀臣、機密

49 有關明代北京城之建造論著甚多，繁不勝引，略見朱偰北京宮闈圖說（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侯著史話，第6章；謝敏聰明北京的城垣與宮闈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第3章；于倬雲編紫禁城宮殿（香港：商務印書館，1982），專論部分（頁18—28）；北京史，第6章。楊子器詠世祖宮詞，見錢謙益列朝詩集（順治9年〔1652〕刻本）丙集第7，頁12上（頁11上下有小傳）。子器今浙江慈谿人，成化23年（1487）進士，官終河南布政使。（此條承陳高華教授函告，特此申謝）

50 詳見註9拙作北京城建造傳說探頤。

51 劉基（伯溫）的傳記資料甚豐富，詳見張廷玉等纂明史（中華書局，1974）卷128，頁3777；又見王馨一撰劉伯溫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劉德隅編明劉伯溫事蹟拾遺（自印本，台北，1976）。關於劉伯溫傳說的初步研究，見拙著“Liu Chi (1311–75) and his Models: The Image-building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Oriens Extremus* 15:1 (June 1968): 34–55，與「讀劉伯溫燒餅歌」，刊籌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香港，1970），頁163—190。

軍師），所以從明中葉起逐漸被神化，寢而在閭里俗說誤認是劉秉忠的孫兒，由是建立血緣關係。這一大膽的臆造，隨被編寫明朝開國講史英烈傳的作者採錄於篇，而二者的關係，便透過演劇、唱曲、說書之媒介，在民間建立牢固的印象。因此，在北京城傳說之衍化當中，劉伯溫便自然地、不着痕迹地取代劉秉忠的位置，輕易為大眾接受⁵²。其次，由於劉伯溫曾主持應天（南京）新都的營建，規畫紫禁城，而事實上北京紫禁城是仿照前者的形制，二者同出一體，所以伯溫雖然與北京城的興建毫無關係（基卒於洪武八年〔1375〕，而北京城的工程至永樂十八年〔1420〕始完成），但在民衆的想像裏便有了關連。因此在種種情況下，許多關於營建南京都城的傳說，便展轉流傳到北方，與大都「那吒城」傳說混淆一起，醞釀成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故事。由於劉伯溫本身的傳說愈變愈荒誕，使他成為近代人皆知曉的神算軍師，逆知未來的大預言家，附會他建造北京城的謠傳也愈來愈豐富，流播也愈來愈廣遠。正因為有這樣的演變，元代大都城之傳說，雖然缺少劉秉忠，並不因時世轉移而消失，以新的面目在現代進一步發展。

最後，這個跨越幾個朝代，有八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傳說，對我們研究民間信仰還有重要啓示，可以應用到其他個案事例。這就是中國傳統中的崇拜英豪觀念，不但活現於「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經世思想，在「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民衆信仰亦表露無遺，故此劉秉忠與劉基不獨是宰執功臣，亦是民間的膜拜偶像。還有，同樣重要的，民間信仰往往禱求超凡的神祇，去禳除他們的苦難，因此北京缺乏水源，人們以為是龍王作孽，所以冀望又釋又道的那吒神去解懸，由是使傳說流傳不衰。不過要注意的，傳說的主角都是神化了的歷史英雄——劉秉忠和劉基，能够感通外物，指使哪吒去降伏龍王，依然以人物為中心，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根據以上數點，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某些民間信仰之持久性，能够跨越時代而廣泛流傳，因此對傳說的研究，足以窺見歷史的另一層面，擴闊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本篇不過發其端緒而已。

52 明末俗說以劉伯溫為劉秉忠之孫，根據英烈傳祖本皇明開運英武傳（萬曆20年〔1691〕序刊本）卷1，頁17上，始見於金(?)獻集言所引。（今日觀之，是書似即萬曆高鳴鳳編纂之類書今獻集言，然傳本未見有此條記載。）後出的英烈傳改修本，如托名徐渭撰之皇明英烈傳（一名雲合奇縱），亦沿襲其說，見趙景深、杜浩校註英烈傳（上海：四聯出版社，1955），頁89。關於劉伯溫在英烈傳之神化臉譜的塑造，詳見拙著“Liu Chi (1311-75) in the *Ying-l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Th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1-2 (December 1967): 26-42。

附錄 近代有關大都城之重要論著選輯（按年月排列）

- 一、G. Bouillard, "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rique du territoire de Pekin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 (Stockholm, 1929), pp.39-59, esp. pp.54-57。
- 二、朱啓鈴、闕鐸：「元大都宮苑圖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1卷第2期（1930.12），頁1—117。
- 三、村田治郎：「元大都の都市計劃に關する一考察」，滿洲學報第3號（1934.12），頁133—142；修訂補充後改題「元の大都の都市計劃に就いて」，刊建築學會論文集第8號（1938.4），頁238—242。
- 四、朱偰：元大都宮殿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9）。
- 五、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3期（1936.9），頁69—120。
- 六、王璧文：「元大都寺觀廟宇建置沿革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4期（1937.6），頁130—161。
- 七、駒井和愛：「元の上都並に大都の平面に就いて」，東亞論叢第3輯（1940.9），頁 127—140。（參見薛蘭譯：「元大都上都平面考」，中和月刊第4卷第1期〔1943.1〕，頁15—21）。
- 八、山根德太郎：「元大都の平面配置」，人文研究第1卷第2號（1949.12），頁 1—31。
- 九、王樸子：「元大都城平面規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頁61—82。
- 十、趙正之遺著：「元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附徐萃芳撰「附記」，1966.6），原刊因「文革」關係擱置，其後收入科技史文集第2輯：建築史專輯，建築史專輯編輯委員會（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10），頁14—27。
- 十一、愛岩松男：「元の大都」，歷史教育第14卷第12號（1966.12），頁 59—65。
- 十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察和發掘」，考古1972年第1期，頁19—82。
- 十三、侯仁之：「元大都城與明清北京城」，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頁 3—68；重刊所著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 159—204。
- 十四、侯仁之、金濤：北京史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5章：「大汗之城——元大都城」。

- 十五、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Imperial Architecture under Mongolian Patronage: Khubilai's Imperial City of Daidu*.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 十六、村田治郎：中國の帝都（京都：綜芸舎，1981.4），第4章：「元大都における平面図型の問題」，頁309—338。
- 十七、陳高華：「元大都史事雜考」，刊北京史研究會編燕京春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頁123—144。
- 十八、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此書有佐竹靖彦日譯，題名元の大都，東京中央公論社出版，1984.6）。
- 十九、蘇天鈞：「郭守敬與大都水利工程」，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頁66—72。
- 二〇、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The Plan of Khubilai Khan's Imperial City," *Artibus Asiae* XLIV, 2-3 (1983): 137—58。
- 二一、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と大都」，刊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12），頁485—518。
- 二二、王燦熾：「談元大都的城牆與城門」，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頁49—57。
- 二三、王北辰：「元大都興建前當地的河湖水系」，環境變遷研究第1輯，北京環境變遷研究會編（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10），頁147—155。
- 二四、王燦熾：「元大都鐘鼓樓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頁23—29。
- 二五、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編寫組：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8），第5章：「元代的大都」。

Legends Surrounding the Building of Ta-tu: The Na-cha City of the Yüan Dynasty

HOK-LAM CHAN

Chinese history abounds with legends about the planning and building of imperial cities, but none are as fanciful as those about Ta-tu, the "Great Capital" of the Mongol-Yüan state and predecessor of Peking, the majestic capital of the Ming and Ch'ing. Ta-tu, which Marco Polo called Cambaluc ("city of the Khan"), was built in the Yen province under Khubilai Khan in 1267-83. The city was designed by the great khan's chief adviser Liu Ping-chung (1216-74), a Buddho-Taoist adept in astronomy, mathematics and the pseudo-sciences. Many legends about the building of Ta-tu grew out of Liu Ping-chung's ingenious designs for the capital. These legends were further embroidered with popular beliefs about the dragon genii who inhabited the lakes and rivers and controlled the water resources of the region.

Two noteworthy references to the legends surrounding the building of Ta-tu are contained in literary collectanea dating from the late Yüan and early Ming. The first is to be found in one of a set of poems on the capital entitled "Nien-hsia ch'u" by the belle lettrist Chang Yü, which says:

There are eleven gates around the walls of Ta-tu,
thatched with hay and paved with earth the *Na-cha* city was built.
The prophecy says if [the walls] were encased in brick and stone,
they will be as long as [the column of] the armored soldiers of the
Heavenly King.

The other, recounted by Ch'ang-ku chen-i (pseudonym) in his miscellany *Nung-t'ien yü-hua*, offers this:

The city of Yen was designed by Liu T'ai-pao [Liu Ping-chung]. There are eleven gates in order to symbolize Na-cha's three heads, six arms and two feet. Shih-tsü [Khubilai Khan] was enthroned in the *keng-shen* year [1260], and the state perished between the *wu-shen* [1368] and *ssu-yu* [1369] years. Altogether one hundred and eleven years elapsed.

These passages would suggest that Ta-tu was called Na-cha city because its gates were designed to symbolize the body of the supernatural deity known as Na-cha. What was the origin of this bizarre legend? Who was Na-cha and what sort of extraordinary power did he command that compelled Liu Ping-chung to construct Ta-tu's gates in his likeness?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is legend on the folk traditions surrounding the building of Peking later?

The principal character in this legend, Na-cha (later also transcribed as No-cha), originally Nata in Sanskrit, was a child deity, the third son of Vaisravana, one of the four "Heavenly Kings" who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was guardian of the north. In the sutras of Tantric Buddhism introduced to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Na-cha is endow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physique and divine power,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himself at will and performing miraculous feats. He is credited with assisting his father in defending the city of An-hsi in western China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Furthermore, his superior power and magical charms were effective in exorcizing the wicked demons and subduing the heavenly dragon who caused droughts. By the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had incorporated Na-cha into the mythological genealogy of the early T'ang general Li Ching (571-649), who had by this tim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Taoist guardian god. Grafted onto this historical figure were some of the most fanciful legends associated with King Vaisravana. What emerged was a mythologized hero known as Pagoda-bearing Heavenly King Li Ching. Na-cha, now a prince and the third son of the Heavenly King, is described as being sixty feet tall, having three heads, six arms (later eight arms) and two feet. In the course of time, many miraculous episodes of Buddhist and Taoist provenance were attributed to Na-cha.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and one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egends surrounding Ta-tu concerns Na-cha's feuds with the dragon genii. It tells of Na-cha bathing in a river, trampling on the "crystal palace," causing all sorts of commotion, and enraging the dragon king. To retaliate, the dragon king sends his son to challenge Na-cha. But Na-cha kills him after a fierce combat, unleashing much chaos in the supernatural world. This legend, probably already well known in Yüan times, provided fertile material for Na-cha's miraculous exploits enumerated in the popular novels *Feng-shen yen-i* (*Tales of the Investiture of Gods*) and *Hsi-yu chi*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later Ming dynas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respective role of Liu Ping-chung, Na-cha and the dragon king in the legend of the building of Ta-tu is clear. Liu Ping-chung invoked Na-cha in designing the gates of the imperial city because he was a guardian deity and was endowed with supernatural power to exorcize demons, and possessed magical charms to produce rain. Moreover, he was believed to have fought the dragon family and subdued the vicious genii who controlled the water resources. Na-cha's physical and magical prowess made him the perfect city-god for Ta-tu. As an imperial city, it required more protection than most from the gods and spirits, and, as a metropolis plagued by water shortage — allegedly engineered by the vicious dragon king — Na-cha's extraordinary powers were highly desirable. The invoking of Na-cha in Liu Ping-chung's design for the "Great Capital," however, is not simply a manifestation of hero worship, it is also an explicit expression of Han Chinese superiority over their Mongol rulers.

The Na-cha/Liu Ping-chung legend and the building of Ta-tu persisted into modern times and along the way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even more bizarre legend about the building of the Ming capital Peking. This majestic imperial city was built in 1403-20 under Emperor Yung-lo, the third Ming ruler. The city planner in the legend has changed to Liu Po-wen (Liu Chi, 1311-75), who was the principal adviser to Ming T'ai-ts'u, the dynastic founder. Like Liu Ping-chung, Liu Chi, an astute statesman and versatile scholar, was intensely mythologized. He became a larger-than-life legendary figure in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era, after passing as an ingenious astrologer, geomancer and prognosticator. In contemporary folktales about the origin of Peking, Liu Po-wen is credited with building an "Eight-armed No-cha city" so that the miraculous deity would exorcize the dragon king and protect the inhabitants from any water shortages. Liu Chi replaces Liu Ping-chung in this bizarre legend probably because, though he died well before the capital was actually built, as a celebrated early Ming hero he was historically more relevant to the building of Peking than his predecessor. Moreover, in folk belief since the late Ming, Liu Chi had become Liu Ping-chung's grandson. This fictitious relationship concocted by imaginative popular writers has made Liu Chi an easily accepted substitut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Thus, the legend of the building of Ta-tu associated with Na-cha and Liu Ping-chung provided the background and sources of the modern legends about the building of the imperial city of Peking. The popularity of this legend undoubtedly has been enhanced by the cult of Liu Chi and Na-cha worship in Chinese folk tradition, but it is also sustained by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